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抽象与具象之路：兼论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四个锚点

魏辅轶

摘 要 本文从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出发,梳理了中国图书馆学理论抽象发展中“面向过程”和“面向集合”的两条发展脉络,发现这两个过程都始于杜定友的“三要素”理论,并且在理论抽象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公理化趋势。进一步研究梳理了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具象化的过程,并指出理论具象化的三种类型:回归式的具象、探寻边界式的具象和内生式的具象。中国图书馆学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理论实践化的方法以及不同理论在现实层面开展竞争的方法,未能在实际工作中找到现实的锚点是造成理论实践化困难的主要原因。相应地,提出理论具象化过程中与图书馆对接的四个锚点——“资源”“服务”“技术”和“需求”。当理论的具象可以紧紧锚定在这四个锚点之上,就形成了“用什么资源,采用何种方式服务,满足何种需求,由哪种技术实现”的逻辑问题,再通过观察和验证进而推动理论的实践化进程。最后,为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突破提出了解决办法:重视高质量的理论具象化研究,在理论具象化中锚定四个锚点,重视读者需求的深入研究,培养更多的研究辅助者,以期推动中国图书馆学理论走上良性发展之路。参考文献 35。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理论 抽象 具象 图书馆工作 图书馆服务

分类号 G250.1

The Abstract and Concrete Way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Theory: Also on the Four Anchor Points of the Practice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WEI Fuyi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of library science,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development contexts of “process-oriented” and “set-oriented” in the abstrac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both processes began with DU Dingyou’s “three elements” theory. The abstraction of “process-oriented” is based on ZHOU Wenjun’s theory of document communication and MI Hao’s theory of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nd YE Ying tried to axiomatize the theory. The abstraction of “set-oriented” also began with the theory of “three elements”, and finally developed into “knowledge resource theory” through “symbolic information theory”, “available set theor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 theory”, and WANG Zizhou made an axiomatic attempt.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an axiomatic trend in both dire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Further,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concretization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theory, and

通信作者:魏辅轶,Email:weifuyi@tiangong.edu.cn,ORCID:0000-0002-6065-0270(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WEI Fuyi,Email:weifuyi@tiangong.edu.cn,ORCID:0000-0002-6065-0270)

points out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oretical concretization: regression concretization, boundary exploration concretization, and endogenous concretization. It also puts forward that what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lacks is not the number of theories, but the method of how to practice and compete between different theorie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At the same time, it is clear that the failure to find a realistic anchor point in the actual work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ifficulty of theoretical practi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difficulty in the practice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ur anchor points in the process of theoretical concretization, which are “resource”, “service”, “technology” and “demand”. It points out that resource is the natural attribute of library, service is a wa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echnology determines the way and efficiency of library service, and demand is the purpose of concretization. When the concretization of the theory can be firmly anchored on these four anchor points, a basic logical question is formed, which is “what resources, how to serve, what purpose to meet, and what technology to achieve”. Then this logical problem forms a mapping relationship with a specific scenario that can be replicated, so as to have the conditions for repeated observation and verification, so that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inferences can be verified. Thus, it can promote the process of theoretical practicality.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lutions for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practice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including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high-quality theoretical representational research, anchoring four anchor points in theoretical representational research,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depth study of readers’ needs, and cultivating more research assistants, so as to mak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theory embark on the road of benign development. 35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theory. Abstract. Concrete. Library work. Library service.

0 引言

在图书馆学研究发展中,理论与实践脱节是困扰许多图书馆学者和图书馆从业者的一个难题。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学者对此问题提出了明确而犀利的观点,认为有些人指责的“理论与实践脱节”,实际是由于这些人对与“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关的、最基本的问题没有科学的、正确的认识^[1]。进入21世纪以来,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工作之间的裂隙进一步扩大,虽然图书馆学界提出各种理论,但图书馆工作却并没从丰富的图书馆学理论中汲取足够的营养。换句话说,图书馆学理论并没有给予图书馆工作足够的动力,图书馆工作始终没有达到理论研究者预想的目标。正如柯平所言:“图书馆工作经验的日益丰富和对越来越形式化的图书馆现象

的大量描述,不仅不能自发地形成思想和理论,反而增强了实践对于理论指导的呼唤以及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诉求。缺少科学性、抽象性的图书馆学,只能是对经验的知识积累而已,致使图书馆学停留在一个经验时代。”^[2]虽然图书馆学界与业界曾经对此问题进行过反思,但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到底是图书馆学理论本身抽象不够深刻,还是在理论具象化过程中图书馆工作不能很好地吸收利用这些理论,又或是图书馆学理论在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抽象与具象之间存在某种隔离,而这种隔离阻碍了图书馆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这些难题是困扰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理论问题。

1 理论的抽象:无用之用

不管是对具体工作的反思,探索因果,试图

构造新的框架,抑或是对研究对象的解构,进而重新组配要素,理论研究都是一种冒险,是一场与现实生活的交互切磋。研究者必须足够勇敢,才能倾其全力,从繁复多样的生活中努力探寻世界的本质,将某种精神的髓核抽离出来;研究者还必须足够敏感,才能意识到某一时刻的微不足道却是另一刻的不可或缺,在一次次转瞬即逝的现实情境中努力创造出那些“无用”的东西。

1.1 理论抽象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任何理论都有一个内在的维度:抽象。抽象是对具体事件的概念化描述,目的是让事件的关系脱离具体的情景,而得到一般性的或具有一定普适性的逻辑命题。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对事物的抽象能力,理论抽象的程度越高就越具备一般性的解释能力,也就意味着可以解释更多的现象。例如,如果有一个苹果,又拿来一个苹果,经验可以表述为“一个苹果和另一个苹果,一共是两个苹果”。经过抽象后,数学的理论可以表述为“ $1+1=2$ ”,这样就可以用来解释更为一般的关系,香蕉、盒子等其他事物的计算也可以被这个理论解释。更进一步,这个现象还可以抽象为“ $a+a=b$ ”,这样就具备了更广泛的普适性。显然“ $a+a=b$ ”的抽象脱离了具体的事物和数字,具备了更加普适的解释力。但是理论越抽象,其实践化的过程可能就越困难。现实中经常被问到理论有什么用,其实这样的问题是在问对现实的抽象程度是不是越高越好。高度抽象的理论必定要脱离具体的现实情境,必定要采用非常抽象的概念来使其逻辑自洽的同时又不丧失解释力。这种看似奇技淫巧般的做法实则具有很深刻的意义,也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

人类的科学理论归根到底都是需要向抽象发展的,只是不同学科领域理论的抽象程度不同,这一点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殊途同归。以自然科学中的量子力学为例,其“弦论”中的很多理论都是由纯粹的概念和逻辑组成的,虽然其理论预测的诸多现象还无法被直接观测,但是这种理论意义却能从本质上指导

人类认识世界的底层架构。社会科学虽然很难找到类似自然科学中无可置疑的规律,但社会科学中所使用的论点和概念,就是组成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规律的“基础材料”。社会科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基础材料”的创新,也就是基本概念的创新。这种创新本质上就是抽象能力的体现,就像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一样,优秀的概念就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粒子”。在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天幕上,不同的时间阶段都有着许多闪亮的“粒子”。

1.2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抽象之始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抽象开始于1932年中国图书馆学先驱者杜定友提出的“三要素说”,即图书馆学理论可抽象为“书、人、法”三个要素^[3],这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第一次比较成系统的理论抽象。后续者刘国钧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图书、人员、设备和方法的“四要素说”^[4]和读者、图书、领导和干部、工作方法、建筑与设备的“五要素说”^[5]。“要素说”是中国图书馆学在理论抽象层面的一次尝试,但其理论抽象程度并不太高,依然保留了很多明显的经验层面的概念。徐引篪和霍国庆这样评价:“要素说本身是一种反论,当人们开始探讨一个事物的组成要素时,他们真正的目的则是探讨事物整体发展规律。”^[6]“要素说”反映了当时图书馆学者对理论抽象的追求和意愿,即便未能有效触及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本质,但为后来“面向过程”的抽象和“面向集合”的抽象提供了基础。因此,可以说“要素说”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种下了理论抽象的种子。

1.3 “面向过程”的图书馆学理论抽象

“面向过程”的抽象,以周文骏的“文献交流说”和宓浩的“知识交流说”为代表。周文骏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本上是利用文献进行情报交流工作的经验的结晶。”^[7]这样的理论将图书馆这个具体的对象抽象为一种图书馆内的人类活动。宓浩更进一步,将这个活动抽象为一

个社会机构的功能,即“图书馆是通过对文献收集、处理、贮存、传递来保证和促进社会知识交流的社会机构”^[8],并从文献出发抽象出了知识的概念。宓浩的抽象有两个进步:第一,使得图书馆学理论脱离了图书馆实体,成为一个并不特定的社会机构;第二,使得图书馆学理论脱离了具体文献,将知识这个抽象的单元作为研究的对象,具备了更普适的解释力。但“面向过程”的抽象并没有在此停滞,后继者们为交流说带来了新的抽象层面,这就是“公理化”。

公理化就是将数理逻辑的内容引入图书馆学,从而将图书馆学抽象升级,形成一个可以逻辑自洽且具备证伪性质的理论体系。采用公理化研究方法的代表性学者是叶鹰。叶鹰在1998年发表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抽象建构》一文中初步提出了构建抽象图书馆学的思想。在“对包括传统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在内的抽象图书馆普遍适用的参量以图书馆流入和流出的信息量最具典型意义”这一观点下,叶鹰尝试将数理逻辑中的微积分与图书馆学相结合,从“交流说”中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概念框架出发,设计了一个关于图书馆信息流入量 i 和流出量 l 的数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将图书馆的知识 K 与技术水平 T 与 i 和 l 用函数等价起来,即“ $L(I, i) = f[N(K, T)]$ ”^[9]。后来他又连续发文对此模型进行了多次修正,力图打通图书馆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隔离,建立一个可以互通的、统一的、信息和知识在图书馆中进行过程化加工处理的理论框架。其目的是进一步将图书馆学推进到数理逻辑层面,用数理逻辑来表达图书馆内信息、知识和其他各种要素之间的数理关系。这是一次非常有创造性的尝试。无独有偶,相似的公理化尝试也发生在理论抽象的另一条发展道路上。

1.4 “面向集合”的图书馆学理论抽象

如果说“面向过程”是试图将图书馆嵌入社会信息和知识的流动中,把图书馆工作看成是一个镶嵌在社会信息流和知识流之内的抽象动态过程,那么“面向集合”的抽象则是以静制动,

试图从元素集合的角度赋予图书馆学一个明确而抽象的研究对象。

1997年郑金山提出了“符号信息论”,认为“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构态信息,而是符号信息,但不仅仅是文献信息。”^[10]他试图将图书馆从社会系统中抽离出来,而把一个信息符号系统集合作为图书馆的研究对象。紧接着,1998年梁灿兴在《图书馆学的核心问题和研究对象新见》一文中提出了“可获得性论”,认为“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等信息机构的工作就是保证文献群中知识单元对于服务对象的可获得性”^[11],并采用集合的运算概念,用“信息推导”“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三个集合的交集表达文献信息的获取域(集合),这个抽象的集合就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梁灿兴更进一步抽象出集合单元的概念。而到了1999年,徐引箴与霍国庆在《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中提出:“图书馆是一种为了利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集合或者说是一种资源体系,而这正是图书馆的本质。”^{[6]17-18}至此,“信息资源管理说”正式登上了图书馆学理论的舞台。相较于“可获得论”而言,“信息资源管理说”实际上扩大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外延,也给图书馆学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经济学视角,为“知识资源论”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2003年,柯平在《从知识论到知识资源论——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的知识基础》一文中初步提出“知识资源论”的思想,“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资源,图书馆学是关于知识资源收集、组织、管理与利用,研究与文献和图书馆相关的知识资源活动的规律,以及研究知识资源系统的要素与环境的一门科学。”^[12]此后,柯平又两次发文对其理论进一步完善。柯平在“信息资源论”的基础上,把信息资源继续抽象为知识资源,无疑是一次极大的进步,也明确了图书馆学天然自带的经济属性。无论是以“信息资源”或“知识资源”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还是之前的“信息符号”或“可获得性单元”,

其本质都是一种集合论的思想,这种元素的集合本身就是公理化的良好材料。最终将集合论的思想融入图书馆学,并尝试公理化抽象的学者是王子舟。

在“面向集合”的公理化道路上,公理化的发展并不具有明显的先后顺序。在“知识资源论”出现之前,2000年王子舟就已经阐述了其“知识集合论”的思想。他同样借鉴数理逻辑的集合论思想,希望将图书馆学对象明确到某种抽象的集合上来。他先将社会文献、图书馆文献和图书馆之外的文献定义为三个不同的知识集合,进而提出知识元素一旦有序排列而成集合就获得新的独立存在价值,“图书馆作为一个有序的知识集合,其存贮知识与检索知识的功能立刻就完全显现出来了。”^[13]后来,王子舟尝试将图书馆的具体工作和事物用集合图形的关系来解释,例如“索引工具中,标目之间的参见、参照关系,就是图型结构”“传统的图书分类表就是典型的树型结构”^[14]。王子舟的尝试虽然没有涉及复杂的集合运算,有些解释还有待完善,但他提出的“知识集合论”是图书馆学理论公理化道路上的又一次重要尝试。

对比“面向过程”的抽象和“面向集合”的抽象,可以发现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尽力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与图书馆的实体分离开来,并且都进入公理化的阶段;而不同之处在于“面向过程”的抽象公理化程度更深,“面向集合”的抽象公理化程度较低,且理论之间的发展相互交错。但无论怎样,这些看似无用的抽象理论,却在图书馆学的发展中有着一种不易察觉而又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无用之用”要想彻底发挥并彰显作用,并让图书馆工作迸发生机,还要发挥理论的另一个维度——“具象”的作用。

2 理论的具象:有用之用

不同于理论的抽象,具象化并不是要填补某种意义的空白,而更像是一种哥伦布式的探索,它不断试探着理论大陆的边界,试图为理论划定

疆域,并竭尽所能将旗帜插到更远的领域之中;或是一种向理论内涵深入探掘,并在理论的躯壳内发现构造理论更加稳定的锚点的“地心探险”,而具象之用于建立起支撑理论灵魂的基石。

2.1 理论的具象是理论实践化的必经之路

“具象”是相反于抽象的过程,是将理论具体化和实践化的过程。任何一种理论如果要用于实践就必定需要一个具象化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需要将理论的内核对应到现实的事物和活动上去,并用理论的内涵去解释这些事物和活动的发展并使之逻辑井然,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预测和推论的能力,这种推论可以通过反复观测,得到证真或者证伪的结果。

具象这一去抽象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理论发展可以层层抽象,同理,也就需要渐渐具象。具象可以把理论降维,降维之后理论的内涵降低,外延更加具体明确,更容易和现实的事物建立起直观的联系。具象和抽象的发展在理论演进的道路上很可能是交织在一起的,抽象化的道路上具象化早已相伴而生、如影随形,这种相伴共生正是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2.2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具象化的类型

2.2.1 回归式的具象

如果说图书馆学理论始于具象,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自施莱廷格最早提出“图书馆学”概念以来,图书馆学就以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而图书馆本身就是一个具象化十足的事物,从图书馆的视角研究图书馆学虽然有自我证明的嫌疑,但也逻辑自洽。许多科学研究都起源于真实的世界,这与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完全一致。从真实的生活出发一点点生发出对世界的抽象认识,从具象到抽象,是一个基本的规律。但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近80余年中,图书馆学理论的具象在不同时间又多次回归到了图书馆本身。

第一次是黄宗忠的具象化。2003年他在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功能的新思考(上)》一文中明确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这里所说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图书馆,既是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具象形态的图书馆,又是一种科学概念的图书馆。”^[15]黄宗忠虽然尽力将图书馆抽象为一种更为泛化的概念,来试图解释图书馆学的一般性,但最终还是回归了图书馆这个具象的实体。“图书馆是一种独立的事物……图书馆是矛盾的统一体……藏与用的矛盾是图书馆的特殊矛盾,规定着图书馆的特有本质,若以图书馆内涵为核心的研究,则构成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学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点。”^[15]

2019年中国图书馆学又一次出现了相似的理论具象。程焕文提出:“不论如何,图书馆学研究如果脱离了图书馆,脱离了图书馆实践,那么就会丧失其本质,失去其价值和意义。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图书馆学研究必须致力于图书馆的发展。”^[16]这一观点也正是一种特定时代下的理论具象。我们很难直接评价回归图书馆的理论具象的利弊,但是这种回归式的具象投射出的确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困难。如果理论具象可以有效实践化,如果理论可以方便地在实践中被使用,如果理论可以准确地预测行为、锁定可以重复的观测结果,那理论的发展应该是向前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就不会反复走入这种轮回式的具象。回归式的具象类似一种寻根行为,实际上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遭遇困难之后做出的一种无力的现实回避。因为在理论不能实践化之后,图书馆这个实体建筑的存在就必然成为了图书馆学理论存在合理性最后的证明。与此同时,不同的理论具象也在不同的时代场景下探寻着自己生存的空间边界。

2.2.2 探寻边界式的具象

探寻边界,在现实中找到新的空间立足,是理论具象的重要目的之一。如果说黄宗忠和程焕文将图书馆学理论的边界限定在图书馆之内,那么张晓林无疑就是将这个边界拓展的人。

2000年张晓林提出知识服务的理论^[17],这个理论本质上是对宓浩等提出的“知识交流说”的具象化。宓浩和张晓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图书馆学边界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释。宓浩的解释相较于张晓林而言更为抽象,希望解释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功能。张晓林的理论具象试图为“知识交流说”在社会活动中探索新的空间,并将其融入更多的社会知识活动中去,在知识经济时代力图为图书馆找到嵌入社会的“途径和入口”^[18],是一种对图书馆工作边界的勇敢拓展。

与张晓林并肩而行,试图探寻理论边界的还有另外一个学者——范并思。范并思在2006年和2014年两次提出了不同层面的具象化理论。2006年范并思提出图书馆2.0理论^[19]。该理论借用Web2.0的理念框架,在技术层面借助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技术革新,为图书馆学的服务理念找寻新的落脚点。2014年他又提出阅读推广的相关理论^[20],试图将图书馆学的研究立在公共阅读的支柱之上。范并思这两次理论的具象,也是一种对图书馆功能和服务边界的探索,前者强调服务理念升级,后者更为关注服务对象和方式的具象化和精细化。

如此向外延探索的理论具象在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并不罕见。有些学者希望将其他学科和技术引入图书馆学,来丰富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如建筑学、心理学、大数据、云计算甚至是区块链和元宇宙等;而另有少数学者则尝试将图书馆学的内容应用到其他领域,这样的具象就形成了所谓的“专门图书馆学”,例如“农业图书馆学”“医学图书馆学”等。但似乎这样的具象尝试在理论研究中并不成功,因为“阐述专门图书馆学理论,过多地借鉴理论图书馆学理论,未免有照猫画虎之嫌”^[21]。

一些类似“专门图书馆学”这种探索边界式的具象大多浅尝辄止。借他山之石,非简单复制所能攻玉,也容易滋生“奇形怪状”的、低水平的学术垃圾,跟风式的学术成果往往为人所诟病,因此有另外一些学者将眼光放在了图书馆学理论的内生具象之上。

2.2.3 内生式的具象

如果回归式的具象是图书馆学理论对现实困难的回避,探寻边界式的具象是对理论缺乏实践能力的抗争,那么内生式的具象就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最有希望的发展方向。

不同于前面两者,内生式的具象虽然也将图书馆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并不止步于图书馆实体或者图书馆具体工作,而是将理论具象在图书馆某一部分的功能或者角色上,同时这些理论又可以置于某一个更为抽象的理论框架之内。换句话说,内生式的具象理论试图在图书馆内部找寻自己的立足锚点。

例如“知识组织说”^[22]和“信息组织说”^[23]是将图书馆学具象化到对知识或者信息的组织整理功能上,“公共信息流通说”^[24]和“公共知识管理说”^[25]是具象化到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上;“知识传播论”^[26]和“知识存取论”^[27]是具象化到图书馆的传播功能上,还有许多理论本文不一而足。这些理论具象现象都可以统一到“面向集合”的抽象或“面向对象”的抽象的过程中去,作为图书馆抽象理论实践化的一部分,为图书馆学理论的实践化打下了一定基础,这也就是具象化的“有用之用”。

无论是抽象的理论还是具象的理论,虽然逻辑基本自洽,但在实践中却令人无所适从,理论给出了一个完美框架,但却无法准确指导图书馆的实际工作。中国图书馆学缺少的不是理论,而是理论实践化的方法以及不同理论在现实层面开展竞争的方法。换句话说,图书馆学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理论,但由于缺少更加深入的具象过程,似乎理论的锚点还浮在表面的浅土层而并未深入到图书馆工作的岩石层。如何解决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实践化困难?这就需要理解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四个锚点,这四个锚点是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真正的解决之道。

3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锚点

理论的抽象和具象蕴含了理论全部的生命

力,但要释放这些能量,就需要两个工具——假设和推论。假设和推论是理论实践化的工具,为理论提供了一个可以检验的通道。无论哪一种理论在实践化的过程中都需要形成可以检验的推论,这种推论创造的场景也一定是在实践中被观察、测量和验证的。从科学上说,这种场景不仅可以被观测,更要求在相同的情况下可以被复现并检验。也就是说,图书馆学理论要想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图书馆工作中找到基本的锚点。这些锚点必须足够稳定,才能保证形成场景的基本要素不变化;锚点也必须足够深刻,来涵盖尽可能多的应用场景。只有这样才能打通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隔阂,使图书馆学理论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更可以使不同理论之间形成可以验证的竞争关系,从而不断地自然选择、淘汰、进化,创造出一个良性的理论演化的生态体系。

在诸多图书馆学理论中,对图书馆要素的研究及相关理论为探寻锚点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中国图书馆学‘要素说’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特别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个逻辑起点”^[2]。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图书馆的一些本质要素就可以逐步地被抽象出来。“三要素说”及其后的“四要素说”“五要素说”是对图书馆基本要素的朴素认识,后来者对图书馆学基本要素的研究并没有停止。柯平、范并思和刘兹恒等人相继提出“资源、服务、管理”“资源、服务、技术”“空间、资源、服务”^[28-30]新三要素。很显然,资源和服务是图书馆的两个核心锚点的观点在图书馆界基本达成共识。但第三个锚点是管理、技术还是空间呢?程焕文给出了解答:“科学技术是推动图书馆变革的第一动力。”^[31]从历史上看,图书馆的每一次革命性的进步都与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从造纸术的发明到印刷术的改良,再到电子文献的繁荣,进而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图书馆2.0运动,直至今日“智慧图书馆”和“元宇宙”技术的出现,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给图书馆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升级。管理虽然可以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效率,但无法

形成本质的革命性的变革,管理的方法仅是在技术框架下做出的优化和改良。空间是图书馆的天然属性,也是图书馆的物理形态,但这种形态并不是图书馆唯一的形态。随着技术的进步,“元宇宙”等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可以打破物理的空间形态,使图书馆有机会成为一个纯数字化的空间,而空间本身就是一个与技术相伴的概念。因此第三个锚点选择技术比管理和空间更为合适。第四个锚点需要有足够的能量将资源、服务和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足够的理论合力。“在图书馆学理论的三个基本面中加入需求的因素,先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释问题,最后解决问题,如此三个基本面的发展就被牢固地绑定到一起,降低了理论之间的张力,形成了一个统一而有力的理论系统。”^[18]所以第四个锚点就是“需求”。确定了四个锚点后,就需要理解这四个锚点在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实践中发挥基本作用的机制。

3.1 资源:图书馆的天然属性

资源是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一个锚点。谈及资源,很多图书馆学理论都习惯使用文献、信息或者知识等概念,但在具象化的过程中,这些概念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为图书馆实践工作中所涉及到的要素众多,需要一个概念将这些要素统一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实践工作与理论具有极大的差异——经济性。经济性意味着稀缺性,很显然,文献、信息和知识等概念无法体现其在真实世界运行的经济属性。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实体,依然无法游离于经济运行规律之外,也就是说图书馆依然具有经济属性。

经济属性就要求将图书馆当作一种资源来对待。“图书馆的共有资源属性是图书馆知识平等获取使命的根源。图书馆天然的竞争性会自然地让具有政治和经济优势的人获得更多,这种天然的竞争性才会让图书馆努力去推动知识的平等获取,提供知识平等获取的机会成为图书馆一项不可推卸的使命。”^[32]图书馆的资源属性是先天的、不可避免的。需要注意的是,

图书馆作为一种资源并不仅仅指图书馆的文献资源,资源是一个综合的概念集合,既包括图书馆物质资源、人力智力资源,也包括图书馆没有产权但也可以调配的部分社会资源。作为资源就要发挥作用,而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建立资源分配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第二个锚点“服务”。

3.2 服务:一种资源的分配制度

图书馆学理论中提及最多的词莫过于“服务”。众多学者在不同场合都在强调图书馆需要加强服务,却鲜有人问“图书馆服务到底是什么”。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空喊一句“图书馆要以读者为本,加强服务”,也只能是一句不知所云、毫无营养的口号。

图书馆服务与图书馆的资源属性息息相关。图书馆服务从本质上说是为了满足特定需求而对图书馆资源施加的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这一定义有几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执行服务活动势必要占用图书馆资源,这种图书馆资源是具有竞争性的;第二,图书馆资源的分配受到制度规范,图书馆资源的占用有强制力保证,图书馆设置这种制度性安排来保证服务活动可以长期持续;第三,资源的占用有其特定的目的,并且这一目的是先于服务本身出现的。图书馆所开展的服务就是一种对资源的分配工作。只有制度化的资源分配机制,才能保证图书馆正常运转。例如,有些图书馆会设置典藏图书库,或者采用借阅分离的运行模式,而另一些图书馆却选择借阅一体的模式。保留一部分图书资源用于阅览或者收藏的模式和将图书全部开放出来用于借出的模式,不仅是服务模式的不同,也是资源分配方式的差异。另外,读者对文献的利用是采用账号下载还是IP控制下载,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是免费还是收费,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都涉及资源的分配制度问题。《图书馆服务宣言》中提到的对读者权利的维护和平等服务^[33],其核心内容正是改变了历史上图书馆对阶级服务的资源分配制度。因此

完全可以说,图书馆对资源分配方式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服务类型,图书馆学理论在具象化时,如果抓住了“服务”这个锚点就相当于锁定了图书馆对资源分配的模式。

3.3 技术:一个被误解的要素

在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技术是一个让图书馆学又爱又恨的要素。技术好像一位外来的“客人”,一方面图书馆学希望从这个客人的口袋里掏出更多的“糖果”滋养图书馆学,另一方面图书馆对这个客人依然保持着安全的社交距离。因为技术的进步给图书馆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革。“信息技术的采用使技术服务部门的更多工作可由辅助人员担任,专业人员可转而从事或兼任读者服务工作,在一些图书馆形成了按学科组织部门的结构模式。”^[34]图书馆的很多工作开始“外包”,同时读者的行为习惯在技术的催动下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而图书馆这个“主人”的反应显然总是慢了半拍。这些变革可能让图书馆员产生一丝忧虑,但更多的担忧来源于这些技术可能会动摇图书馆原有的价值基础。“由于技术化倾向重技术而轻理论,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研究,致使我们的基础理论相当薄弱,学科规范难以建立,学科概念、术语变幻频繁,一些基本的、核心的概念认识始终难以统一,理论研究低层次重复,理论成果带有明显的经验性、普泛性、无序性和不确定性。”^[35]技术似乎成为了理论的头号天敌,但实际上这是对技术最大的误解。

技术天生就是用来解决效率问题的。更快的响应速度、更好的产品或者服务和更低的读者成本都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优势。很多技术最初的形态就是抽象的理论,在这些理论具象化之后,技术才从中脱胎而出,成为理论得以确立的重要锚点,并改良了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过程中的效率问题。同时,技术也给图书馆学带来了诸多烦恼,究其原因是图书馆学研究者过度看重这个客人华丽的衣着外表,而无法为其一身的才华找到应用的场景,于是崇拜者

趋之若鹜,质疑者避之不及,误解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误解的消除靠的是理论具象化过程中技术的逐步融入,而不是生硬添加。2020年前后“区块链”概念开始在图书馆界升温,但还没等到区块链技术在图书馆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2021年“元宇宙”就横空出世,这种急转式的研究变向表明图书馆对其技术的核心内容完全没有理解和掌握,更多的是一种对热点的追逐。但这种错误并不在技术本身。图书馆欣喜于“糖果”的甜美却忽视了对“客人”的接待,忽略了技术水平可以影响图书馆资源服务的呈现方式和具体途径,而这些方式和途径却在理论具象锁定应用场景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技术是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第三个锚点。

3.4 需求:资源、服务和技术的结合力

当资源、服务和三个锚点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图书馆学理论似乎马上就可以锁定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但是这里缺少最后一个要素,就是需求,也就是图书馆进行这一系列资源配置的目的是什么。因此,需求就成为理论能否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需求一直是图书馆学理论抽象中低调的存在,也是理论具象化中的隐秘角落。究其原因需求既十分具体又难以琢磨。需求是一种特定的要求,也需要用特定的事物来满足,因此需求难以被直接抽象;与此同时,需求很难被直接观察到,对需求的探索大多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如通过分析种种“痕迹”或者“询问”种种问题的方式来获取。但需求是否明确却对图书馆实际的工作效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图书馆众多服务中,有些服务的需求是非常明确的,如开馆闭馆、查收查引、查重查新、学位论文收藏、成果认定、文献传递等。这些需求有些是由行政命令直接产生,有些是由读者明确提供,无论是哪种,只要需求是明确的,图书馆提供这些服务的效果就都比较好。还有一些需求是非常模糊的,如研究者在科研过程中对文献资源的需求、深层次的知识分析、学科馆员

服务等。由于这些需求是模糊的甚至是未知的,图书馆提供这些服务的效果就差强人意。

那么图书馆有没有需求明确却做得不怎么好的服务呢?这种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读者找不到在馆的图书,图书馆没有座位,无法获取明确的文献等。这些看似简单的服务,效果却常常不尽如人意。如何为内容明确但无法满足的需求找到应对措施,正是图书馆应该迫切解决的首要问题。还有最后一种情况,即需求不明确但图书馆也可能做得较好的服务。这种服务就需要图书馆投入大量的资源,比如图书馆采购的电子文献和纸本馆藏。图书馆虽然不十分清楚读者需要何种文献,但通过大量的购买可以弥补精准的缺失。这也是很多资金充足的图书馆所采用的服务模式。当然这样的模式下,资源利用效率就要大打折扣。

在理论具象化中对需求的锚定就是锁定一个可以复制的服务场景的最后一根锁链。“资源结合需求就有了意义;服务结合需求就有了目标;技术结合需求就有了效率。”^[18]因此需求成为了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的最后一个锚点。当理论的具象可以紧紧锚定在这四个锚点之上,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逻辑问题:“用什么资源,采用何种方式服务,满足何种需求,由哪种技术实现”,那么这个逻辑问题就与一个可以复制的具体场景形成了映射关系,也就具备了重复观察和验证的条件。

4 结语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并不缺乏抽象的理论,虽然抽象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深层次的公理化程度,但是在抽象层面上,已经有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尝试。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困难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高质量的具象化理论成果。

首先,研究者热衷于提出自己新的理论,而忽视对原有理论的佐证工作。一个理论的确立,不仅是提出者从无到有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后继者对理论不断补充、修正和证明。这些

工作几乎占到一种理论研究发展过程中90%以上的内容。不但需要后继者探索理论的边界,深挖理论的内涵,还需要做出假设和推论,利用不同的锚点锁定一个可以重复观测的应用场景,从而证明或者证伪一个假设,进而再对理论进行修补或者扬弃。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鲜有这样为原理论做出高质量具象化工作的学者,导致理论的传承性和连贯性正在逐步消失。

其次,即便是存在一些具象化的理论,但這些理论也仅仅锚定了一个或者两个锚点,没有能完全锚定所有的锚点,也就无法锁定可以复制的应用场景,导致实践过程中无法得到预期的效果。例如,知识服务和阅读推广锚定了服务,却忽视了图书馆的人力资源、技术呈现以及用户需求,而陷入无法大规模复制的困境;图书馆2.0锚定了技术,但忽略了图书馆的资源基础,最终也走向没落;回归纸本的理论锚定了图书馆资源,但并未重视技术和读者的需求,前途困难重重。

再次,在这四个锚点中,对需求的锚定最为重要,是理论具象化中特别需要攻克的难题。锚定需求是图书馆学理论实践化中不能回避的一环,因为需求衔接了其余三个锚点,也是图书馆工作的实际意义所在。而当前我国学者对需求的研究尤其是深入的理论研究并不充分。图书馆对自己的需求相对了解,许多面向馆员使用、满足馆员需求的技术服务都能较好地落地。但当图书馆闷头向前、飞驰冲向智慧图书馆时,能否时不时回头看一下读者是否跟在身边?不然当推开智慧大门的那一刻,我们将是多么孤单。

最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进步不仅在于创新者对理论的抽象,更在于后继者对理论的具象工作。这需要图书馆学教育培养更多的“辅助者”而非大量的“原创者”。著书立说、扬名立万固然是学者的追求,但如果能与前人辅车相依,一生取辅弼之勋也同样值得敬佩。图书馆学的理论教育中,需要渗透这种“辅助”的价值观念,图书馆学家不一定要做一个理论创造者。当大多数的研究者能成为理论的辅助者和验证者时,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就走上了良性的发展之路。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图情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9VXK0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马恒通. 关于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思考[J]. 图书情报工作, 1989(5): 32-34. (MA H T. Thought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1989(5): 32-34.)
- [2] 柯平. 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 抽象、内核与价值[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1, 47(6): 4-17. (KE P. Ideological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abstract, core and valu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1, 47(6): 4-17.)
- [3] 杜定友. 图书馆管理法上之新观点[J]. 浙江图书馆月刊, 1923(9): 23-28. (DU D Y. New views on library management methods[J]. Monthly Journal of Zhejiang Library, 1923(9): 23-28.)
- [4] 刘国钧. 图书馆学要旨[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4: 11. (LIU G J. The main idea of library science[M].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34: 11.)
- [5] 刘国钧. 什么是图书馆学[J].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 1957(1): 1-5. (LIU G J. What is library science[J]. Newslett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ibrary, 1957(1): 1-5.)
- [6] 徐引篪, 霍国庆.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XU Y C, HUO G Q. Theories for modern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1999.)
- [7] 周文骏. 概论图书馆学[J]. 图书馆学研究, 1983(3): 10-18. (ZHOU W J.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1983(3): 10-18.)
- [8] 宓浩. 图书馆学原理[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51. (MI H. Principals of library science[M].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8: 51.)
- [9] 叶鹰.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抽象建构[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8(3): 86-88. (YE Y. 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8(3): 86-88.)
- [10] 郑金山.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2): 52-53. (ZHENG J S. A new probe into the research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1997(2): 52-53.)
- [11] 梁灿兴. 图书馆学的核心问题和研究对象新见[J]. 图书馆, 1998(5): 13-14. (LIANG C X. A new opinion about the core problem and research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1998(5): 13-14.)
- [12] 柯平. 从知识论到知识资源论——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的知识基础[C]//第四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河南, 2003: 134-153. (KE P. From knowledge theory to knowledge resource theory: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he knowledge base of library science[C]//The Fourth Symposium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Library Science. Henan, 2003: 134-153.)
- [13] 王子舟. 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4): 7-12. (WANG Z Z. On knowledge sets: exploring on objects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0(4): 7-12.)
- [14] 王子舟. 知识集合再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阐释[J]. 图书情报工作, 2000(8): 5-11. (WANG Z Z. Again on the sets of knowledge: elucidation about the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studie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0(8): 5-11.)
- [15] 黄宗忠.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义、功能的新思考(上)[J]. 图书馆论坛, 2003(6): 4-12, 25. (HUANG Z Z. New thinking on the object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of library science(I)[J]. Library Tribune, 2003(6): 4-12, 25.)
- [16] 程焕文. 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谨以此文纪念李大钊130周年诞辰刘国钧120周年诞辰[J]. 图书馆杂志, 2019, 38(12): 11-15. (CHENG H W. Library science is the science about libraries: in commemoration of LI Dazhao's 130th birthday and LIU Guojun's 120th birthday[J]. Library Journal, 2019, 38(12): 11-15.)
- [17] 张晓林. 走向知识服务: 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5): 30-35. (ZHANG X L. Towards knowledge services: seeking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21st centu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0(5): 30-35.)
- [18] 魏辅轶.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跨世纪的三次“重逢”与“莫比乌斯陷阱”[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1, 47(1):

- 34-46. (WEI F Y. Three "reunions" cross one century and "Mobius Trap"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theo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1, 47(1): 34-46.)
- [19] 范并思, 胡小菁. 图书馆2.0: 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6(1): 2-7. (FAN B S, HU X J. Library 2.0: building the new library services[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06(1): 2-7.)
- [20] 范并思. 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4, 40(5): 4-13. (FAN B S. Reading promo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analysis on basic theo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4, 40(5): 4-13.)
- [21] 包和平. 专门图书馆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 图书馆建设, 1994(4): 16-17. (BAO H P. Some problems needing attention in the research of special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Development, 1994(4): 16-17.)
- [22] 王知津. 知识组织的研究范围及发展策略[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8(4): 3-8. (WANG Z J. The research scop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knowledge organization[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98(4): 3-8.)
- [23] 金胜勇, 刘志辉.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析论[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7(1): 4-7. (JIN S Y, LIU Z H. Discussion on the research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2007(1): 4-7.)
- [24] 龚蛟腾, 侯经川, 文庭孝. 公共知识管理学——关于图书馆学本质的思考[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3(6): 2-6. (GONG J T, HOU J C, WEN T X. The public knowledge management science: thoughts on the essence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03(6): 2-6.)
- [25] 丁国顺. 从图书馆的形态研究看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基本概念[J]. 图书馆学研究, 1998(4): 6-10. (DING G S. On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basic concept of library science from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form[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1998(4): 6-10.)
- [26] 马恒通. 图书馆知识传播论纲[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7(6): 26-29. (MA H T. On the library knowledge dissemination[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7(6): 26-29.)
- [27] 周久凤. 图书馆的本质特征: 知识存取[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01(4): 6-8. (ZHOU J F.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a library: storage and out-put of knowledge[J]. The Library Journal of Henan, 2001(4): 6-8.)
- [28] 柯平, 白庆珉, 李卓卓, 等. 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436. (KE P, BAI Q M, LI Z Z, et al. Research on library knowledge management[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6: 436.)
- [29] 范并思. 纪念图书馆2.0运动五周年[J]. 图书情报研究, 2011, 4(4): 21-24. (FAN B S.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library 2.0 movement[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011, 4(4): 21-24.)
- [30] 刘兹恒, 涂志芳. 数字学术环境下学术图书馆发展新形态研究——以空间、资源和服务“三要素”为视角[J]. 图书情报工作, 2017, 61(16): 15-23. (LIU Z H, TU Z F. Research on the new states of academic library development in digital scholarship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resource and servi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7, 61(16): 15-23.)
- [31] 程焕文, 赵冬梅. 资源为王 服务为本 技术为用——程焕文谈高校图书馆管理的理念[J]. 晋图学刊, 2020(1): 1-10. (CHENG H W, ZHAO D M. Resource as king, service as foundation and technology as use: CHENG Huanwen's concepts of university library management[J]. Shanxi Library Journal, 2020(1): 1-10.)
- [32] 魏辅轶. 共有资源视角下图书馆的经济学分析[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7, 26(6): 56-63. (WEI F Y. Economic analysis of library defined as common resources[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17, 26(6): 56-63.)
- [33] 吴建中, 胡越, 黄宗忠. 《图书馆服务宣言》专家笔谈[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8(6): 12-18. (WU J Z, HU Y, HUANG Z Z. Experts' written comments on *The Declaration of Library Servi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6): 12-18.)
- [34] 范并思, 胡小菁. 论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学的影响[J]. 图书馆, 2000(1): 16-21. (FAN B S, HU X J.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s influence on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2000(1): 16-21.)
- [35] 储流杰. 图书馆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J]. 图书馆, 1999(5): 8-10. (CHU L J. Technicalization tendencies on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J]. Library, 1999(5): 8-10.)

魏辅轶 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馆员。天津 300387。

(收稿日期: 2022-03-12)